

希望设立一个“国家阅读基金”

□朱永新

一个国家的国民阅读水平,往往标志着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国民阅读能力和阅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国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创造能力和发展潜力,直接关系到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强弱。

国民阅读是一项公共文化工程,世界许多国家都由国家公共财政提供资金,设立国家阅读基金,以推进国民阅读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如英国1992年成立图书信托基金会,每年由国家财政投入资金并吸纳社会慈善资金,开展以“阅读起跑线”为核心的全民阅读工作;德国在1988年成立德国促进阅读基金会,其历任名誉主席都由德国总统担任;俄罗斯也在1994年建立俄罗斯读书基金会。此外,在美国、保加利亚、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也都设立有各类阅读基金会或国民阅读扶持工程。

阅读推广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活动,需要投入较大财力并持之以恒地开展。在我国,目前虽然中央政府和许多地方政府都在大力倡导阅读并举行各种阅读节活动,但由于资金严重不足,力量非常有限,全民阅读工作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为将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求我们将阅读问题列为国家重要议题,由国家财政提供专项资金予以保障。

为此,我希望由国家财政出资,尽快设立一个国家阅读基金,推动全民阅读工作,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也可以采取国家设立种子基金的方式,吸引民间资金一起投入。

从资金规模来看,考虑到国民阅读基金的巨大社会价值及社会覆盖面,建议每年由国家财政提供1亿~2亿元“国家阅读基金”专项资金,再吸收民间资金2亿~3亿元,专门用于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和国民阅读扶持项目。

国家阅读基金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国民阅读推动工作。一是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世界读书日、城市阅读节、读书周等全民阅读活动,营造阅读氛围,提供公共阅读平台,开展阅读推广工作。全民阅读活动形式包括开展读书沙龙、读书知识竞赛、读书演讲比赛或读书征文、图书漂流、中华经典阅读大赛等活动,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推动儿童与青少年阅读。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只有在儿童时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才能在成年后保持阅读行为。西方发达国家儿童在6~9个月时就开始阅读,而中国儿童则普遍要到2~3岁左右才开始阅读。美国儿童在4岁后进入独立、自主性的大量阅读阶段,而中国儿童平均到8岁才能达到这个水平。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还存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中国儿童的阅读教育严重不足,同时阅读观念也普遍滞后。通过设立国家阅读基金,尽早开展“阅读起跑线”等儿童阅读工程,推动儿童阅读,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三是满足弱势群体阅读需求。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通过阅读救助活动,不但可以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还能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

(下转 A2版)

教育改革的艰巨和复杂

□王渝生

两会召开前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再次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自然受到了两会代表和委员们的极大关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的1/4个世纪以来,我国有4次重大的教育改革举措:1985年、1993年、1999年和这次从2008年8月启动至今历时1年半的《规划纲要》中的6项教育体制改革和相应的10项试点工程。

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第一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才评价制度;第二是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还要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第三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去行政化,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第四是改革办学体制,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第五是改革管理体制,做到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第六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教育开放,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以开放促改革。

以上这6个方面的改革,应该还是比较全面系统的了。但改革具有极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它涉及到观念、体制,还涉及到习惯势力和切身利益。笔者有幸成为教育规划纲要的咨询专家,在1年多的战略研究过程中,对于具体的改革措施则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好不容易有了共识,如改革考试制度中的高中文理分科,专家和领导都赞同取消,认为这样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但是一拿到社会上征求群众意见,“问计于民”,则发现赞成取消文理分科的还不到一半,多数人认为从减轻学生负担的角度考虑,还是文理分科为好。这次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对此发表的意见也众说纷纭。

因此,改革需要协调、需要试点。为此,这次教育规划纲要专门设置了10个改革试点项目,内容包括推进素质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职业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深化办学体制、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

有的代表和委员在讨论中指出,这次改革有了愿景,但改革的措施和方法,手段尚不甚明了。

例如,关于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改革试点,纲要提出要“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长效机制”和“建立有效保障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稳定机制”,但没有强制性的有力措施。以至于早在17年前的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本世纪(注:指20世纪)末达到4%,达到发展中国家80年代的平均水平”,以及2006年3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10年达到4%的目标均未实现,使这4%成为历年两会热点。这次《规划纲要》则把4%的目标推到了2012年,原定的2000年、2010年又推后,一共推了12年之久,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朱永新
全国人大常委

我们对生物安全的认识越来越清楚

——转基因作物利弊专家谈

□本报记者 王卉 张巧玲

日前,50多名科技工作者聚首北京,参加转基因作物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

专家表示,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培育新品种属于新事物,对此出现争议和质疑是正常的。有关转基因技术的讨论,应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进行。在呼吁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这项工作的同时,也希望科学家和媒体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向公众传播现代生物技术、食品与环境安全等方面的科学知识。

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国家“973”计划“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与控制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彭于发,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所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吴孔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对授粉昆虫蜜蜂是否有影响

《科学时报》:蜜蜂是上千种水果、蔬菜、鲜花和谷物的主要授粉工。我注意到有文章引用来自国外关于蜜蜂的资料显示,有些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里,蜜蜂的数量减少了一半。那么,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有没有类似结论?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推广之后,会不会对其他生物包括微生物有不利影响?

彭于发:迄今为止,国内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抗虫棉花,尚没有看到文章或者文献报道说国内外的转基因抗虫棉对自然环境中的蜜蜂或者传粉昆虫有不利影响。

我本人在2000年以前就做了一些初步的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性试验,此后则专业从事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基于转基因作物推广后可能会对农田生态和自然环境产生潜在风险,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转基因的相关研究,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都先后加强了转基因作物的生物安全性研究。在包括国家“973”计划、“863”计划、1999年启动实施的“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以及2008年年底启动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和重大专项中,都精心安排了生物安全项目,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室内评价到田间评价和监测,都进行了系统的战略布局。

在所有这些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项目中,都部署了抗病虫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对非靶标生物影响的研究,包括对蜜蜂的影响。因为目前应用的抗虫棉花和前不久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其抗虫物质主要是一种晶体蛋白,它只是专一性杀死危害棉花和水稻的鳞翅目害虫,而对其他许多昆虫则没有毒杀作用,也不会像化学农药那样残留在环境中。

抗虫转基因棉花和水稻不仅能有效控制棉铃虫、水稻螟虫等鳞翅目害虫的危害,保障水稻产量,还能减少70%的化学农药用量。而正是农药的过量和不合理使用,影响了物种多样性,例如农药使授粉昆虫和害虫天敌数量减少。

同样,美国十多年来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花和玉米,也没有发现对蜜蜂的不良影响。

知识产权和信息公开问题

《科学时报》:在我国转基因作物的推进过程中,做了哪些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

黄大昉:已经颁发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这两个产品来说,是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是国内专家开展自主创新研究的成果。

关于我们侵犯了国外的知识产权的说法是不实的。例如,我们在抗虫转基因水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我国自主开发的抗虫棉所使用的基因相似,这个基因不仅获得我国知识产权局的金奖,也获得了国外的知识产权奖项。

(下转 A3版)

■两会三人谈·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

专项组织管理状况有改进但仍不理想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涉及领域广泛,参与研究的单位众多,组织实施的管理部门多头,统筹协调难度大。这些原因导致了重大专项组织管理体系层次多、效率低。

去年两会我们曾经提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工作进展较慢。同时,在鼓励自主创新

新重大政策的落实、科技经费的规范管理、专项项目责任制的建立和有效的监管、实施,以及如何调动参与部门、地方和各类企业积极性等方面都面临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今年在管理上有所改进。如过去重大专项不能发

放劳务费,现在改成间接经费里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发放劳务费;过去经费分配要求写得特别细,现在在财务管理上也有改进。

但经费管理的效率仍然不理想。2008年启动的项目,2009年的经费到现在还没有下来。有些项目要求经费后补,但是没有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也

引起了大家的担心。大家关心的是预算究竟会不会被认可。而且这种办法在财务操作上也存在一些难题。

我们希望改革不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财政科技经费管理办法,应按财政年度而不是自然年度拨付和结算科技经费。将经费的审核重点从预算转到对科研经费使用过程和结果的监督审计上。

产学研结合是重大专项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还没有形成每个专项都有固定的制度要求。我们建议对高校和研究院所牵头的研发项目,要以向企业转移技术作为主要考核要求;对企业牵头的研发项目,要着重考核其成果应用及对产业链的辐射作用。明确产学研各方的分工责任和合作机制以及知识产权的归属,发挥重大科技专项在引导产学研用合作方面的示范作用。

我对重大专项最关注的还是最后产生的实际效果。很多参与重大专项的单位都有疑问:为什么国家这么重视,但运作起来效率很低,经费迟迟不到位,管理制度不明朗?目前,科技部已经成立了专项办,但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还没有专门部门负责,很多问题还在逐步推动当中。

(本报记者 陈欢欢/采访整理)

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高技术局局长田静:

专项内涵应更具灵活性

从大方向来说,16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选择是具有长远眼光和预见性的,国家在这些领域确实需要作出比较长远的布局。比如设“核高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和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都是战略性、基础性的研发布局,从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一定要发展起来。也就是说,16个重大专项的大方向都是对的。当然,随着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变化,就专项本身的内涵而言,应该是动态变化的。

科技规划布局上应该作出比较长久的安排,这可以在某些重要领域集中力量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其灵活性。特别是微电子这个领域,技术和需求发展都很迅速,需要研究的问题与重大专项立项时的情况相比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在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重大专项中,为应对金融危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家对新能源的需求显著增加,对新型太阳能装备和电力电子器件的相应需求就变得很迫切,因此就应作出相应的安排。然而,在重大专项批准时,并没有考虑和预见到这些变化。

可见,一些需求的技术内涵和技术前沿都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要解决一个大方向上的问题,不可能一直按开打预想的路线,十年二十年地走下去,所以规划应该是动态的。一个好的科技战略规划,首先当然是大方向不能错,但是过程中也不能一条路走到底,遇到问题要进行调整。基于这样实事求是的现实考虑,在“十二五”规划中对包括重大专项在内的科技布局作出一些调整,加入一些新的内容进去,调整一些方向的力度,都是好事情。

除此之外,16个重大专项也

不可能涵盖所有的重要方向,因为那只是当时形势下的选择。比如,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问题,在当时尚不可能预计到现今的形势和压力,美、日等国家都在酝酿发射“嗅碳”卫星,而我国尚没有完整可靠的监测手段,就有可能在后续的发展中造成比较被动的局面。另一个例子是新一代

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重大专项,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发展完善TD技术,现在来看,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三网融合的迅速推进,都已经带来新的需求,中央已经将其作为信息技术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机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当然有必要对其内涵作出调整。(下转 A2版)



全国人大代表、龙芯总设计师胡伟武:

重大专项为民族复兴奠基

通过实施“核高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后,是选择培养出100个院士,还是在中国打造一个自主的Wintel体系支撑我国的信息产业发展?我答案很清晰。也许在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不怕问题。

我是“核高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专家组的成员。从2006年“核高基”实施方案的编写开始,到实施计划的编写、参与组织实施,并承担相应课题,今年已是第五个年头,对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认识也在逐步提升。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最重要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作过两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

划纲要,第一次是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规划》。现在看来,那个规划纲要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时隔50年后,我们又作了一个15年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我的认识是,它将起到奠定我国民族复兴基础的作用。

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是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催化剂。它体现了人们对科技作用认识的提高。科技发展最初是由好奇心驱动,到后来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服务,现在人们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期待,则是紧密地把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不是放大的“863”计划,“973”计划,也不是探索型的科技计划,而是任

务型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支持的都是跟国家战略相关的科技内容。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也是科研模式的重要突破,它紧密围绕国家需求。以前,我们做科研项目,经常是要先看西方发达国家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也要做,这样的科研脱离了自已的实践和需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紧密结合自己的需求,不跟风。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是很成功的。

当然,由于没有经验,刚开始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时,大家都不清楚该如何实施。我也曾认为它就是放大的了的“863”计划。随着项目的实施,我们的认识也在逐步提高。

(下转 A2版)

描绘中国至2050年科技发展蓝图

《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系列报告出版

《科学时报》:在我国转基因作物的推进过程中,做了哪些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

黄大昉:已经颁发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这两个产品来说,是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是国内专家开展自主创新研究的成果。

关于我们侵犯了国外的知识产权的说法是不实的。例如,我们在抗虫转基因水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我国自主开发的抗虫棉所使用的基因相似,这个基因不仅获得我国知识产权局的金奖,也获得了国外的知识产权奖项。

(下转 A3版)

责任编辑:张虹

□新闻热线:010-82614583
□总编室电话:010-82614597
□电子邮箱:news@stimes.cn

领域,包括: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海洋、油气资源、人口健康、农业、生态与环境、生物资源、区域发展、空间、信息、先进制造、先进材料、纳米、大科学装置、重大交叉前沿、国家与公共安全的战略需求,从我国国情出发设计了相应的科技发展战略图。

战略研究报告揭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现代化的历程本质上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历史,近现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密切相关。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既面临着可能发生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健康、空天海洋、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严峻挑战,必须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我国八大经济社会基础和战略体系,必须

着力解决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22个战略性科技问题。中国科技发展到今天,绝不能简单地照搬他国科技发展模式,也绝不能跟在他国后面亦步亦趋。

据了解,该系列报告是我国科技界战略思想库的又一重大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前瞻性、权威性和科学性。系列报告突出的亮点在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到2020年,系列报告是在此基础上集中从国家层面考虑,分近期(2020年)、中期(2030年)、长期(2050年)三个阶段描述18个领域的相应需求、目标、任务、途径,重点刻画核心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以及实现途径。首次提出构建我国八大经济社会基础和战略体系以及2050年重要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

迄今系列报告已出版中文版

15卷,而系列报告的英文版(已出版7卷)由中德两国两大科学出版巨头——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和德国施普林格出版公司联合出版,并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科学家对中国乃至世界未来一个阶段的思考,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又一重大成果。

出版方表示,该系列报告的出版,不是研究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中国科学院将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入开展重要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战略研究,并适时发布研究成果,每5年修订一次相关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为国家宏观科技决策提供科学建议,使社会和公众更好地了解科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作用。

(钟华)